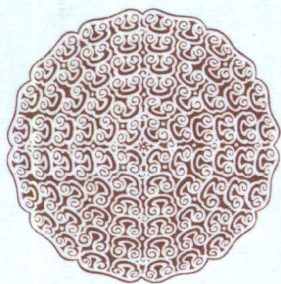


暨南国学丛书

玄学和诗学



XUANXUE HE 'SHIXUE

徐国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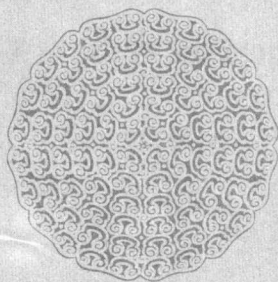
0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235.05
X715

暨 南 国 学 丛 书

玄学和诗学



X U A N X U E H E S H I X U E

徐国荣 著



200297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玄学和诗学/徐国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1

ISBN 7-5004-4762-0

I. 玄… II. 徐… III. ①玄学-研究-中国-古代②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B235.05②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708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暨南国学丛书序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初在南京创办的暨南学堂。其诞生是出于华侨教育的迫切需要。

我国古代不乏在文化和经贸上的对外交流，汉、唐、宋三朝尤甚。相比之下，明代虽有郑和的下西洋，清康熙帝也对外来文化怀有很大的兴趣，但总的来说，这两朝多处于海禁时期。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大清朝封闭的国门，自此，海禁大开。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和美洲的开拓，我国东南沿海的穷苦人民也因迫于生计而出国谋生，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不少政治流亡者流落到了东南亚，使得南洋群岛的华人大增。在世界风潮和国内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海外侨胞的近代教育也为之兴起。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改变了过去私塾义学的办学模式，相继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但由于地处南洋的此类学堂多缺乏师资和教材，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在华侨中普遍出现了回国升学的愿望。

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员前往爪哇和新加坡等地视察华侨教育，1906年，清政府学部再度派人到南洋调查学务，年底，电咨两江总督端方关于在南京办理爪哇侨生归国读书事，得到了端方的肯定。端方向朝廷上奏折，提出了南洋各岛和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侨民如有愿送子弟来宁就学，“并当一律收取，以宏教泽而系侨情”。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奏折，招收侨生的暨南学堂遂于南京开始筹办。1907年3月，国内第一所华侨学校在

南京鼓楼薛家巷诞生，因学生多来自南洋，故取《尚书·禹贡》中语：“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名之为“暨南学堂”。

暨南学堂在辛亥革命中停办，1918年又在南京薛家巷复校，分设师范、商业、补习诸科和小学。因侨校所负“声教南暨”的使命，遂据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立下了“忠信笃敬”的校训。在经过了商科迁沪及与东南大学合设上海商科大学之后，暨南迁校上海近郊的真如，使得在此地的1923年到1937年，成为了暨南校史上的辉煌时期。1927年郑洪年被任命为校长，提出了三部六院的华侨最高学府发展目标，暨南学校得以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经历过南京创建、真如发展、迁址孤岛和福建建阳以及战后回沪等时期，在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在校侨生甚少，加以物质条件十分困难，遂于1949年9月合并入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逐年增多，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于1958年在广州重建，陶铸同志兼任校长。经近10年的努力，暨大已发展成一所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重灾区，被迫于1970年撤消，校址被占，各系科分别并入其他各校。197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并进行重点扶植，自此，暨大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多年来，学校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教学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重新恢复了华侨最高学府的地位。

在暨南大学迄今98年的历史中，虽经历了三落三起的曲折，也因战争和政治的诸多原因，使“系侨情”的宗旨受到了干扰，但就总体而言，始终是本着“宏教泽”的目的而不忘“声教南暨”的。从办学之始，就是为了适应华侨眷恋乡土、挚爱祖国文化之需，而将为华侨子弟开设祖国语言、文化等课程置于首位。

在1927年郑洪年校长制定的《国立暨南大学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办学目的、方针是将暨南学校“扩充为一完善之大学”，“以期从质量上完成华侨之最高学府。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曾短暂代理校长的沈鹏飞也认为“文学院的文史课程，为发扬我国故有文化之主要学问”。因此，对暨南大学这一侨校而言，传统的“国学”具有了本土之学与“声教”“南暨”的特殊的、双重的意义。而在暨南大学的历史上，国学也确实曾有过很高的地位和较长时期的辉煌。

1927年秋，暨南大学的中国语文学系成立，开始招收新生，两年以后，文学院成立，下设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四系。文学院院长为著名学者陈钟凡，中国语文学系主任为夏丐尊，后由陈钟凡兼任，此后又由陈柱尊继任中文系主任。外国语文学系主任为叶公超，继任主任梁实秋，历史社会学系主任黄凌霜，继任主任许德珩。在文学院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李达、邓初民、钱亦石、杨公达、洪深、夏衍、张君勱、张世禄、沈从文、徐中舒、陆侃如、冯沅君等。即使是中学部，也有任国文教师的曹聚仁、汪静之，任英文教师的周谷城、顾仲彝、许国璋等著名学者。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曾先后担任暨大文学院院长长的有陈钟凡、郑振铎、许杰、刘大杰、吴文祺等著名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有夏丐尊、陈钟凡、陈柱尊、龙沐勋、张世禄、郑振铎、许杰、刘大杰、郝昺衡等，担任历史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历史地理学系）主任的有黄凌霜、许德珩、张凤、周谷城、周予同、丁山等知名学者。1928年陈钟凡任中文系主任时，除自任散文、文学史教学外，还有教授陈柱教诗、古方言、专家文，刘疇教诗、《说文》、音韵，张凤教古文字学，兼任讲师陆侃如教诗史、诗论，郑振铎教小说，饶孟侃教文学概

论、文法，讲师冯淑兰教词和词史，张世禄教语音学，龙沐勋、王家吉、马承钧教各体文，徐中舒教各体文和古文字学。仅此已可知当时暨大中文系教师阵容之盛。

在郑振铎任文学院院长时，第一年度（1935—1936）全力整理课程，然后努力充实中文、外文、史地诸系的图书资料，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文学院还创办了三种学术刊物：《文史季刊》、《地理资料》和《中国戏剧》。校长何炳松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和《近世欧洲史》等，他亲自组织编纂《中国通史》教材，自任委员，另有郑振铎、周予同、陈高慵、周谷城等为委员，由周谷城教授编著成书，问世后，深得好评，被很多大学用作教材，一再翻印，后来还在港澳、台湾和国外流行。暨大很重视在学生中开展学术活动，其中不少都属于国学范畴，如鲁迅在1927年和1929年曾三次被邀到暨大演讲，其中第三次所讲的是《离骚与反离骚》。中文系在1935年10月到11月间，曾先后举行两次讨论会，第一次讨论“文学之遗产”，第二次讨论“文学之趋势”。20世纪30年代，龙沐勋在暨南大学创立读书会，每天早上领着三四十个男女学生朗诵诗词，领会声情，使学生的诗词创作一时甚盛。龙沐勋又在叶恭绰等人的赞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在1933—1936年，前后出版11期，对词学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暨南园不仅学会和刊物众多，而且很重视对文艺遗产的学习、继承，如文学院院长陈钟凡为能使学生了解古音韵的奥秘，在1933年请昆曲名家俞振飞到校讲学，使得昆曲也在校园中流传开来。即使暨大经历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战火，学校遭受到不小损失，一度人员分散各地，但1936年《东方杂志》1月号刊载的黎照寰《青年努力新趋势》一文，仍将暨大与其他著名高校并提，在论述了全国教育界的形势后说：“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

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同年的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暨南大学地处战区，被夷为瓦砾场。在迁址租界后，“孤岛”时期的暨大，学术活动仍在进行。《暨大丛刊》持续编纂，十巨册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参考了一百多种图书资料，经四年编纂，于1940年出版，成为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参考书。继《中国通史》出版后，周谷城又在1939年出版了《中国政治史》，郑振铎出版了《中国版画史》。1940年，暨大创办《学林》月刊，所发的如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的新史学》、吴文祺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都是带总结性的重要论文。即使在南迁福建建阳的数年中，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也未中断学术研究。抗战胜利后，复员上海，文学院的著名教授及所讲授的课程就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小说戏剧选，吴文祺的文字学、音韵学和修辞学，许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李笠、丁山的文字学，钱钟书的欧美名著选和文学批评，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等。

在暨南大学复校广州后，文史两系分别由文艺理论家萧殷和中外关系史家朱杰勤任系主任。即使来自“左”的思潮干扰不断，学术研究也没有停止，如中文系在民间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上就很有成绩，历史系则完成了《番禺史志》的修改定稿。黄轶球教授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越南汉诗的卓越成就》的重要论文，张天翼、陈残云、秦牧等著名作家都曾到暨大作报告或讲课。但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原则的确立，再加以暨大作为侨校已变更了早先的办学宗旨，传统意义的“国学”研究，在暨大1958—1966年的八年历史中，是难以讳言的中衰时期。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后，暨南大学在1978年复办并招生，著名作家秦牧和文艺学家饶芃子教授先后任中文系

主任，方言学家詹伯慧教授在 80 年代曾任文学院院长。新时期以来，暨大的古代文学学科虽无在上海真如时期那样的诸多大家，但也出现了一批名师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老一辈学者谭冀民教授的唐宋文学研究，老诗人陈芦荻的刘禹锡研究，艾治平教授和郑孟彤教授的唐宋文学研究，李文初教授的汉魏六朝文学及陶渊明研究，洪柏昭教授的元曲和唐宋文学研究，王景霓教授的杜牧研究，都有较大影响，其中艾治平教授的《古典诗词艺术探幽》，郑孟彤教授的《唐宋诗词赏析》都在 20 年前获得了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至今，八十高龄的艾治平教授仍著书不辍，其中涉及古代诗词的著作就有 10 种之多，堪称成果累累，其他的老师也多是退而不休，仍在持续着自己的学术研究。

近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暨南大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学校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办学方向，承担起培养海外高层人才的特殊任务，并成为了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在办学水平全面提高，科研能力节节上升同时，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学科成员不仅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而且建立起了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现在暨大从事古代文学和文献教学与科研的十多名主要成员中，只有两人是硕士，其余都是文学博士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近 90% 的成员年龄在 50 岁以下，充满了朝气和锐气。暨南大学古代文学学科自 198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经两代人的努力，20 年后终于有所突破，在去年获得批准，具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建起古代文学博士点和古代文献硕士点，并在今年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生，标志着学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现在的暨大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科，主要有四个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韵文学，儒释道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不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也出现了一批较有质量和影响的成果。其中韵文学方向以词学研究

为主，艾治平教授的《婉约词派的流变》、《清词论说》、《花间词艺术》，魏中林的《词综注》，赵维江的《金元词论稿》和我的《唐宋词美学》、《中国词学批评史》（合著）等，多具有原创性。诗学研究有李文初教授等人合著的《中国山水诗史》和《中国山水文化》，李文初以诗歌为主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和魏中林的《清代诗学与中国文化》，徐国荣的《中古感伤文学原论》，也是颇具首创性的著作。在儒释道与中国古代文学方向上，蒋述卓从事研究较早，其完成于80年代的博士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被收入季羨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丛书出版，还有《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在文化的关照下》、《宗教艺术论》等著作，此外，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复古与复元古》，张海沙的《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分别论述了庄学、儒学与禅宗对古代美学和文学的影响，史小军的《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苏桂宁的《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也属于该方向的著作。古代叙事文学有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和《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等。古代文学史料学有张玉春的《史记版本研究》等，以及集体编著的《宋代文学理论集成》、《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军事散文精选》、《中国历代小品选》、《沈伦期末之问集校注》等。在以上四个方向以外，我本人又有交叉性、边缘性、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如专著《有声画与无声诗》、《中国绘画思想史》、《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和《学者闻一多》（合著）等。

由于近年来对科研的提倡和重视，在高校“211工程”建设中，从教育部、广东省，直到学校，都对学科建设、发展给予了较大的投入、支持，更促使我们不得不努力，新的研究成果也随之产生。为此，我们据本学科点成员近年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研究课题，编辑了这套丛书，共计11种，名之为《暨南国学丛

书》，计有：徐国荣的《玄学和诗学》，张海沙的《禅门宗派与诗学研究》，聂巧平的《宋代杜诗学研究》，史小军的《明代七子派研究》，王进驹的《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全秋菊的《古代荒诞剧研究》，陆勇强的《陈维崧年谱》，魏中林的《近代爱国诗潮研究》，赵维江的《古代词的形式嬗变》，程国赋的《三言二拍研究》以及我的《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其中或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经多年打磨后终与读者见面，或为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古委会、教育部、广东省、省高教厅立项的科研项目。从书名可见，它们仍在四个研究方向之内，而就个人而言，则标志着自己研究范围的延伸、扩大和合理发展，对集体来说，则形成了覆盖面较广的研究成果，在多具有原创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因各人立题和写作的时间不同，篇幅大小有异，自然完成也有先后，丛书打算在两年多内陆续出版。可以相信，在这 11 种著作出齐后，暨大古代文学和文献的研究也达到了新的水平。

我们这群人，经历不同，长幼有别，来到暨南大学的时间先后有异，治学的兴趣和方向更是有很大差别，但由于今日都在暨南园内，所作以集体的面目出现，以“暨南”来命名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其义又非止于此，以“暨南”为名，既是起“名片”作用，又意在继承和发扬暨南大学近百年的优良传统，不忘我们今日作为暨南人所应继续的“声教讫于四海”之历史责任。虽古代文学与文献仅是国学研究中的一类，难以尽赅传统国学的全部，但无疑又是国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辨析命名同时，我们相信在属于我们近邻的史学和其他学科研究上，暨南大学也定会出現许多新成果，如果这样，我们很愿意为展示暨南国学研究的集体成果而先走一步。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无论是暨南，还是国学，也同样担负着虽“旧邦”而“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既然跨越了世纪，当然也要努力造就和见证未来历史崭新的一页，在以本丛

书来续写暨大国学研究的历史，迎接暨大百年校庆同时，我们也将满怀豪情，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

邓乔彬

2004年9月26日于暨南大学明湖苑临风轩

目 录

暨南国学丛书序·····	邓乔彬 (1)
第一章 引论：“玄学和诗学”名义解析·····	(1)
第二章 玄学和文学的对立与对话·····	(16)
第三章 汉晋名士的事数标榜·····	(31)
第四章 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	(46)
第五章 汉魏诗歌艺术传统的断层化·····	(57)
第六章 从《世说新语》看玄言诗的世俗底蕴·····	(74)
第七章 寒人的崛起与玄学诗学之式微·····	(85)
第八章 “竹林七贤”及其构成考论·····	(99)
第九章 嵇阮和庄学品格的实践化·····	(114)
第十章 嵇康父子价值取向的玄理依据·····	(125)
第十一章 嵇康之死和“索琴而弹”的意蕴·····	(139)
第十二章 玄学与艺术意境理论的逻辑生成·····	(149)
第十三章 音乐与魏晋玄学·····	(172)
附论：	
一 玄言诗流变研究之检讨·····	(199)
二 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特征论·····	(214)
古风（代后记）·····	(236)

第一章

引论：“玄学和诗学”名义解析

玄学，就其学科本身来说，是流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当然也是一种文化思潮，对于当时人们（尤其是士人阶层）的影响——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等多类文化层面——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而“诗学”的涵义，近年来学界的使用则颇不一致，有广义的，有狭义的，有传统的，有现代的。如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之“前言”中所说的“诗学并非仅仅指有关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包括诗、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的学问或理论的通称。诗学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或简称文论”。^①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史上，“诗学”则主要指诗歌创作实践，故也有论者通过大量的文学史材料得出结论说：“传统所说的‘诗学’，其体裁范围是指汉魏以来文人的五七言古近体诗创作系统，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则为这种文人诗学之渊源。至于汉之赋学、唐宋之词学、元明之曲学，则是于诗学先后并存的韵文学中的其他体裁系统。其主要的载体是实际的诗歌创作，而非纯粹的理论 and 批评。”^②因而或把“诗学”作诗歌之学解（即关于诗歌的一切学问），或作为“文艺学”的别称，或干脆被当作“文学”而用，又甚或被含混而用、难以确指者。所

① 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钱志熙：《“诗学”一词的传统涵义、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中国诗歌研究》第一辑。

以，在将“玄学”与“诗学”牵合到一起时，很有必要对其名义进行一番辨析与解析。

本来，中国古代对于“诗学”名词本身的解析并没有多大兴趣，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的特殊重要地位，似乎也无须着力于此。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吸收介绍，尤其是近年来文艺理论界对此名词的高频率引用，使之常常作为“文艺学”或“文学”（而非单指诗歌）来用，这是源于西方学者的用法。因为公元前4世纪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就有《诗学》著作问世，并认为“诗学”就是“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诗要写得好，情节应如何安排，以及这个研究所有的其他问题”^①等等。亚氏这里所说的“诗学”主要是针对古希腊史诗而言的，由于古希腊史诗对西方文学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前，这个“诗学”常常借以指称“文学”或“文学理论”，在逻辑上大致也是可以的，在实际操作中也是可行的。而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如果还要如此原封不动地借用这个概念来指代文学理论，则必须先要有个明确的背景交代。所以，有不少学者在使用“诗学”这个概念时，基本上就其字面意义而言的，亦即指诗歌理论，或者宽泛一点，指关于诗歌的理论及相关学说（包括诗歌史、诗论史、诗歌批评等等）。但是，本文所说的“玄学和诗学”中的“诗学”，很显然与上述各种概念是不合的。它指的是一种“诗学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艺术精神。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以诗歌（特别是抒情诗）为主体的，有关诗歌方面的理论最多最丰富，也最为精彩，大致也可以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流。在这些古代诗歌理论中，历代作家总结出一系列对于诗歌

^① 罗念生译：《诗学·诗艺》，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审美方面的范畴与概念，有学者曾总结说：“历览前朝后代诗歌论著，我们会发现五个复现率很高的审美观念，这就是：志、情、形、境、神，它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五根重要的支柱。我们追踪一下这五个重要的审美观念的来龙去脉，探索一下它们丰富的内涵，理清一下它们相互间内在和外在的联系，就会进一步发现：中国自有诗以来，诗歌理论对诗歌创作实践的抽象表述是：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①此论大致可自圆其说。实际上，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些诗论概念，就会发现，中国古人对于诗歌是极其虔诚的，诗人们把诗歌视作其生命本身，因而对于诗歌的欣赏与审美也就充满着艺术精神。这样的例子当然俯拾皆是，不必列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不少论者常常用“诗学精神”代指“艺术精神”——这也是符合中国文学艺术和美学实际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玄学”与“诗学”组合到一起，使之成为一复合名词。因为，玄学对于魏晋六朝士人有着全方位的影响，作为一种流行了二百年左右的思想潮流，它也使得这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充满着诗意盎然的艺术精神。因此，玄学本身也就是一种诗学。更何况，玄学作为一种思辨哲学，其与诗歌本身也充满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古今中外不少文化史上的大家（如席勒、王国维等）也往往徘徊于哲学与文学两者之间一样。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个概念并给予全书一个纲领式的明确交代，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 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一往情深的诗心

《世说新语·任诞》篇：“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

^① 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桓伊字子野，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也可说是著名的音乐家。他善于吹笛，甚至还有神奇的传说，伏滔《长笛赋序》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长笛。传之耆老，云蔡邕之所作也。”（《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三）从桓伊的生平事迹看，他又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他善于吹笛，喜听悲音。《世说新语·任诞篇》又载曰：“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左将军桓伊善音乐，孝武饮燕，谢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申，请进之。’帝赏其放率，听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抚箏而歌怨诗，因以为谏也。”关于此事，《北堂书钞》卷一百一十引《语林》说：“晋孝武祖宴西堂，诏桓子野弹箏，桓乃抚箏而歌怨诗，悲厉之响，一堂流涕。”两者可能是同一回事。但无论如何，都只是说明桓伊的诗人性情。这份情，首先是对生命精神的肯定和张扬。从理论上说，魏晋玄学中曾有过圣人有情无情之辨，而自王弼倡“圣人有情”说之后，此论虽未必令所有玄学名士所信服，但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他们自己既认为无法做“圣人”，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圣人”，所以便更加心安理得而又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有情而多情的世俗中人。

在王弼之前，何晏等人认为“圣人无情”，而王弼则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忘物，失之多矣。”（《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王弼传》）当然，王弼的思想